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鼓舞着广大企业家更加积极进取、奋发有为。2021年9月，企业家精神成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之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地方文化作为滋养企业家精神的丰饶厚土，为企业家精神的萌生与茁壮成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环境。地处三北大地的慈溪，拥有独特的地域文化历史，其围垦文化、盐业文化与棉业文化不仅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也孕育并涵养了“慈商精神”。千年围垦，慈溪人向海要地，勇气、毅力与规划兼具，赋予慈商坚韧、包容的特质；千年盐业，盐场开辟到盐运忙碌，从业者于艰难中坚守，磨炼慈商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品质；今天的慈溪因棉而立，这段历史见证了慈溪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协作以及重视科学实验的精神。此三者皆为“慈商精神”的源头活水。回溯往昔，剖析围垦历程、盐业轨迹和棉业兴衰，清晰呈现它们如何丝丝缕缕编织进“慈商精神”的锦缎，为理解“慈商精神”的成因与内涵提供珍贵视角，有助于更好地传承与弘扬这一独特精神财富。

慈溪千年围垦对“慈商精神”之塑造

卜佳玉

慈溪作为中国县域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与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密切相关。围垦文化作为慈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当地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塑造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也深刻影响了慈商的精神世界，为慈商的商业活动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

慈溪围垦文化和“慈商精神”的历史联结

“唐则涂也，宋则地也。”千百年的海涂围垦所孕育而成的围垦文化，是慈溪文化的核心，也是慈溪发展的动力基因。精神由文化而生。“慈商精神”在慈溪这片由海涂围垦而成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大地见证着“慈商精神”的起源，围垦文化赋予“慈商精神”独特的底色与内涵。

一是慈溪围垦文化为近现代慈商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一方面，围垦后的土地一部分用于农业生产，发展了棉花业等农业产业，为慈溪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支撑，也见证了慈商从事农产品加工和售卖相关商业活动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交通运输能力弱和土地匮乏一直阻碍慈溪经济的发展。通过不断围垦、修复、兴建等措施，慈溪土地面积不断扩大，城市交通运输能力得到提升，也解决了土地少而引发的诸多问题。二是慈溪围垦文化为“慈商精神”增添了最深沉的精神底色。围垦文化作为慈溪这座城市标志性的文化名片，深刻

影响着慈溪这座城市的文化特征与精神特质。慈商作为慈溪最有特色的代表群体之一，凝聚成“慈商精神”诞生于慈溪大地，更脱胎于慈溪的围垦精神，因而慈溪围垦文化中的精神特质，成了“慈商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慈商精神”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影响着慈溪商人的商业理念和行为方式。

慈溪围垦文化对“慈商精神”的具体形塑

文化塑造精神特质。“慈商精神”的形成离不开围垦文化的塑造。纵观古今，“慈商精神”与围垦精神有着较多契合之处，这也是围垦文化在当代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一是传承艰苦创业精神。慈溪人擅长“无中生有”。慈溪围垦造田的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0世纪以前。围垦向海要地，扩大了慈溪的陆地面积，慈商白手起家，通过创业求生致富。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劳动条件，慈溪人民克服巨大的工程难度，围垦出大量土地。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在慈商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慈商创业是无资源禀赋、无区位优势，大部分慈商是白手起家，在创业初期往往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诸多困难，但他们不畏艰难，凭借着坚韧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逐步开拓市场，赢得商机。二是延续开拓创新精神。围垦过程中，慈溪人民需要不断研究和创新围垦技术和方法，以应对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和工程需求。在围垦过程中，从

最初的简单堆土筑堤到后来采用先进的泥浆筑堤施工、泥心坝施工方法等，围垦技术不断创新和提高，体现了慈溪人民的开拓创新精神。这种精研巧筑的精神在慈商身上体现为敢于创新，他们不断探索新的商业领域和商业模式，勇于尝试新技术、新方法，推动企业的发展和进步。三是继承开放包容精神。围垦活动使得慈溪的海岸线不断北移，吸引了周边地区和外省人口的迁入。移民的到来带来了不同的文化、技术和思想，促进了慈溪与外界的交流和融合。这种移民文化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培养了慈溪人的开放包容精神。慈商在商业活动中也体现了这种开放包容精神，他们积极与不同地区的商人合作，吸收不同文化的商业理念和经营方式，拓宽了商业视野，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四是弘扬家国情怀。慈溪人对家乡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围垦活动不仅为慈溪人民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为慈溪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基础。慈溪人民通过围垦改善了家乡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了家乡的经济实力，体现了对家乡的热爱和建设家乡的责任感。慈商在取得商业成功后，往往会反哺家乡，投资家乡建设，促进家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体现了家国情怀，也是围垦文化对“慈商精神”的重要塑造。

慈溪围垦文化对当代“慈商精神”的深远影响

当前，慈溪本土企业正处于从传统型企业向智能制造企业转

型的关键时期。激发市场活力，关键在于企业家，在于企业家精神。围垦文化则为发挥“慈商精神”最大效应提供了不竭源泉。

一是让“慈商精神”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劲驱动力。“慈商精神”继承了围垦文化中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特质，在当今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创新精神驱使慈商积极探索科技创新之路，勇于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研发创新，如同先辈们在围垦时大胆尝试新的围垦技术与方法一般。二是让“慈商精神”成为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关键推动力。作为民营经济参与的山海协作项目等共同富裕项目，为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来源，实现了优势互补，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慈溪的公牛集团、美华实业等企业参与“早上好”共同富裕慈善基金捐赠，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资金支持，其背后是围垦文化中互助共赢精神的延续。三是让“慈商精神”成为文化自信自强的关键驱动力。围垦文化所蕴含的艰苦奋斗、勤劳团结等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完整地传承于“慈商精神”之中。在现代商业社会，慈商以这些文化特质为支撑，诚信经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树立良好榜样，引领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和价值观。这种将围垦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相结合的方式，不仅为企业发展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新的途径和载体，从而有力地推进了文化自信自强的进程。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宁波市红色文化研究基地）

慈溪千年盐业对“慈商精神”之塑造

姚松林 王亿

慈溪，这片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地域，其制盐传统可追溯至千年之前。盐民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他们的汗水与泪水不仅滋养了整个三北大地，也塑造了慈溪人民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盐文化不仅在千年前支撑着慈溪的经济发展，更孕育了一种独特的企业家精神——“慈商精神”。“慈商精神”不仅是慈溪人民独有的精神标识，更是慈溪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慈商精神”深深融入慈溪人民的血脉，成为驱动当地经济社会持续进步与创新的动力源泉。

千年制盐史催生“慈商精神”

慈溪的辉煌历史，离不开“盐”的滋养与塑造。在浙江东部的慈溪，这片土地不仅见证了中国悠久的制盐历史，更孕育了独特的“慈商精神”。

慈溪盐场位于杭州湾南岸、翠屏山丘陵北麓之间的广袤地带，这些地区日照充足、地势平坦，为盐场大规模发展制盐业提供了良好基础。慈溪的制盐业，在唐代已具一定规模，鸣鹤场和石堰场就创设于唐代。过去的慈溪盐场主要分布于翠屏山丘陵北麓一线。而随着海岸线不断向北淤积，盐场也随之北移。北宋仁宗赵祯庆历七年，余姚县知县谢景初率民筑筑了第一条拦海大塘，即大古塘，并将盐场移至大古塘以北。至北宋哲宗赵煦元符初年，鸣鹤场被划归越州（今绍兴）管辖。随后，余姚石堰（今属慈溪）分为东、西两场与鸣鹤场。宋代的慈溪自东至西

已建有龙头、鸣鹤、石堰三盐场。至元成宗铁穆耳元贞初年，鸣鹤场、石堰东、西场三场合并为一场，并迁至鹤皋乡（即鸣鹤镇）。清朝时期，鸣鹤场所辖场地进一步扩展，东至镇海龙头场界，西至石堰场界，南至车厩驿分界，北至观海卫公界。

盐业生产对于慈溪而言意义重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慈溪是浙江最为重要的盐产地。直至上世纪80年代，庵东盐产长期冠全省之首，“浙东盐仓”“浙江盐都”美名远扬。从简单暴晒，到温差萃取；从煮海熬波，再到先进的反渗透膜……小小一粒盐，凝结了人们的智慧与汗水，促进了工商业和经济发展。而今，这片昔日的盐田已蜕变为蓬勃发展的宁波北湾新区，成为区域经济转型与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成就，也催生着“慈商精神”的凝聚与成长。

千年盐文化涵养“慈商精神”

历史上慈溪因盐而兴。慈溪地名、地方风俗以及方言俚语都深受制盐文化的影响，盐文化是慈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慈商精神”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慈溪地名中的“场”“灶”“甲”“仓”，皆与“制盐”紧密相关。有些看似与盐毫不相关的地名，其实与盐也有着关系。如慈溪庵东境内有东一、东二、东三，西一、西二、西三等地名。民国时，庵东盐务分局在所属盐区按东西序列设场务所，东一处在东侧第一位，以此类推。慈溪的地名中的“盐文化”不仅是该

地区的地理标识，也是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反映了慈溪地区社会经济活动的演变过程。慈溪的地方风俗也离不开盐文化的烙印，散发出浓郁的盐巴味。历史上，慈溪是盐的故乡，悠久的历史与发达的盐业，孕育了丰富的盐文化。在盐业生产过程中，亦存在着一系列与盐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习俗，如筑漏之俗、测盐度之俗、祭牛大王之俗和拜“坑坑姑娘”之俗，这些产盐习俗也影响着盐民的生活习俗。而慈溪人口中的一些老话、谚语、歇后语，同样印着慈溪产盐的历史文化。如老话“敲竹杠”“开胖账”“泡汤哉”“六月债，还得快”“七月七，里扣出”等等。

在盐业生产中，盐民面临着极高的劳动强度和艰苦的生活条件，深受庵商、蓬长、盐霸等中间商和地方势力的种种欺压与剥削，从而对历史上关心盐民疾苦、致力于改善他们生活状况的历史人物充满了感激之情。例如，为感恩彭韶而建的彭公祠、为纪念赵源所建的小宝塔等。种种经历与事件成了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涵养着肯吃苦、懂感恩的“慈商精神”特质。

千年盐业塑造“慈商精神”内涵

慈溪盐民悠久的制盐历史与深厚的盐文化底蕴，不仅促进了盐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还深刻塑造了慈溪人的精神风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坚韧不拔的吃苦品质、精益求精的创新态度。

一是斗争精神。尽管盐业在地方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盐民的生活条件却极为艰苦，有“盐价珍珠贵，盐民饿道旁”的说法。这种残酷的生活状况促使

盐民形成了顽强的斗争精神，并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庵东盐民的“七二三”暴动便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体现，从“怒打秤放局”、反对“六折收盐”，到成立盐区第一个民主政权……庵东盐民的革命精神贯穿始终。它反映了盐民群体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的坚定立场，成为慈溪红色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慈溪人民不断奋进。

二是吃苦精神。在煎煮法制盐时期，盐民们面临着浓烟和高温的双重考验，长时间劳作可能导致视力严重受损甚至失明。此外，他们还必须忍受来自官方军队及地方官员的各种压迫与剥削，包括高额收税和严苛的法律制裁。一旦被登记为盐户，盐民几乎无法改变身份地位。这种残酷境遇令盐民形成了坚韧不拔的吃苦品质。

三是精益求精的创新态度。慈溪盐民在长期盐业生产实践中铸就了其不断追求精益求精的创新特质，集中体现在盐业技术的进步与演变中。慈溪各盐场的制盐方法经历了从“煎盐”“板晒”到“滩晒”三个阶段的演变。宋代时期，煎熬之法盛行，三大盐场均采用刮泥淋卤与火力煎盐的制法。明代以后，聚团公煎成为主流形式，煎盐工具包括簸盘、铁盘和铁锅等。清代咸丰二年，板晒制盐法兴起，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煎盐方法，盐民得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制盐技术的不断提高，慈溪制盐方法由传统的“煎盐”“板晒”，改为“滩晒”制卤和制盐，这是当代慈溪制盐技术上的一次重大进步和创新。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



图片来源：慈溪发布

当代慈溪棉花生产历史的影响探析

潘筱晨

今天的慈溪市综合实力保持全国百强县（市）第六位，工商业较为发达，而在历史上，慈溪却是因棉花生产而建立的县。1954年10月，为建立慈溪集中产棉区，国务院对甬北三县行政区域作了大面积调整，以“三北”（慈溪、余姚、镇海三县的北部地区）为基础，划定慈溪县新的行政区域。县境调整后的慈溪县成为集中产棉县，常年植棉40余万亩，植棉面积占全县耕地面积的60%以上，约占浙江省棉田面积的三分之一，有“浙江棉仓”“百里棉乡”之称。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慈溪，从县委书记到一般老百姓，从政府部门到工厂企业，主要工作几乎都围绕着棉花进行，这为改革开放以后慈溪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精神与文化基础。

培养了慈溪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

慈溪地处浙东沿海，雨量多而分布不均，常年秋季多雨，棉花收成不稳定，遇到秋旱产量就比一般年份高；反之，就大减产，不能保证高产丰收。因此，慈溪通过组织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为棉花稳产高产奠定基础。据《慈溪市棉花志》记载，1955年10月下旬，慈溪挖掘大小河流14条，总土方14.7万立方米。1956年冬至1957年春，兴修大小河流116处，投入29.3万工，完成土石方78.2万立方米。1958年至1963年的6年间，共投放劳力1100多万工，完成土方4800多万立方米的水利工程，工程包括修建加固海塘100多千米，开挖和疏浚主要河流410多千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慈溪不断新掘和拓宽河流，改善各河区的抗旱、排涝能力。1974年冬至1978年5月，新掘和拓宽主要河流20条，累计投入2453万工，投资365万元，其中群众自筹104万元。1984年全县共挖河2985条，长69.67千米，计311.975万立方米；棉地开深沟22.17万亩，冬翻30.79万亩，春翻34.99万亩；铺上河泥17.11万亩，每亩138担；积土杂肥7.64万亩，从而加深了耕作层，增加了有机质，为高产奠定了基础。

通过大抓棉花生产的基本建设，慈溪人民认识到，只有艰苦奋斗、付出辛勤的劳动，才会迎来棉花生产的高光时刻，这为改革开放以后慈溪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支撑。

养成了慈溪人民重视科学技术的精神品质

新中国成立后，慈溪先后成立栽培、种子、植保、科研、土壤肥料等专门技术（科研）机构，开展棉花试验。同时组织县、区、乡（公社）、村（大队）各级棉花技术人员，积极开展各级试验示范，促进棉花生产技术的普及和提高。同时，每年还抓住冬、春农闲期间，举办植棉技术培训班或技术讲座，总结交流植棉先进经验。据《慈溪市棉花志》记载，1957年开始，各区农技站除日常工作外还举行棉花

栽培对比试验；1958年，各区农技站均进行丰产试验。1959年3月，浒山人民公社农业科学研究所、浒山人民公社科普工作组制定“棉花技术试验计划”，共有22个试验项目。在此过程中，慈溪各级干部和技术员、有经验棉农相结合，坚持了种试验田的制度，进行了高产实验和对比实验，在广大群众中倡导学习棉花技术的风气。1964年全县普训技术骨干三万余人。1965年，农业部委托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科教片《慈溪棉花》，向全国推广慈溪植棉经验，有力推动了全国各地的棉花生产。1984年，慈溪组织了“棉花亩产皮棉300斤高产协作攻关”试验，全县25个承包户、3个棉场和棉科所，共29个点，大部分采用两膜栽培，亩产250多斤，比大田增产41%。

通过开展棉花试验，慈溪人民认识到，科学技术是农业生产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尊重科学，才能够实现农产品的优质高产，这为改革开放以后慈溪产业创新提供了动力源泉。

锻造了慈溪人民团结协作的精神品质

成为集中产棉县以后，慈溪各级组织围绕棉花生产这一中心，全面安排各项工作，促进棉花生产落实，县委议事议程上将有关棉花生产的重要问题列于首位。与此同时，还加强对与棉花生产的生产资料供应、采摘、加工等部门的领导，从上到下，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领导机构，组织银行、供销社、手工业社等各部门积极地为棉花生产服务。在棉花收购工作上，全县每个产棉区都设立收购站，并建立了现代化设备的加工厂，采取收购、加工一条龙的办法，从收购、加工一直到外调都在一个（产棉）区内解决。此外，还积极组织农业合作社，发挥集体经营的优越性。慈溪通过把分散的小农经营联合起来，由组织起来的农民用集体的力量来搞水利、积肥、改良工具和种子、改进耕作技术等。1955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介绍慈溪五洞闸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经验的简报材料写了按语，五洞闸成为全国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一面旗帜。与此同时，慈溪龙南乡建立的互助合作网，通过采取中心社示范和合作网的交流活动，采取社长碰头、召开专业会议、田间参观检查、个别联系的方式，克服了社干部多少和管理相对滞后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在《合作网的制度应当在全国推广》的材料上对慈溪龙南乡开创的互助合作网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

通过团结协作，并肩前行，慈溪人民认识到，只有形成协调一致的整体运作，才能够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推动工农业持续发展，这为改革开放以后慈溪工商业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宁波市红色文化研究基地）